



现年96岁高龄的吴祖培在接受快报记者采访 快报记者 唐伟超 摄

他是誉满中西的电子工程专家,他是轰动全国的『蜗牛事件』当事人

『日光灯之父』与南京的不了情

■猜猜看,上世纪50年代,一支日光灯管值多少钱?

■九只玻璃蜗牛里藏着什么机密,竟然惹得江青大动肝火?

■96岁的日光灯之父,他的养生秘诀是什么?

2009年4月30日上午,位于迈皋桥华电路1号的南京华东电子集团公司迎来了一位尊贵的客人,他就是该公司在上世纪50年代的第一任老厂长,被誉为“中国日光灯之父”和“中国显像管之父”、现中国工程院院士吴祖培。鲜为人知的是,这位迄今为止中国内地唯一获得美国信息显示学会(SID)授予特别表彰奖的老院士,竟然和南京有着深厚的渊源。7月3日,《发现周刊》记者在南京龙江某小区,与96岁高龄的吴祖培院士零距离接触,倾听他讲述与南京三段割舍不了的情缘。

第一次来南京,哪儿都不敢去

1937年8月26日,刚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的浙江嘉兴人吴祖培第一次来到了南京。这时,他23岁。“是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中央电工器材厂筹备处到我们学校去,把我要过来的。”吴老精神矍铄,思维敏捷,对往事的回忆能够精确到具体的哪一天。

在南京,吴祖培居住在水晶台附近。第一次来南京,他对这个作为国民政府首都的城市充满了景仰与好奇,但他却不能随意地去深入其中,因为“这时局势已经不妙了,每一天,都会拉空袭警报,我们根本就不被允许出去,非常的不安全。”吴祖培和同事就将精力放在筹集、整理资料上,准备日后到湖南湘潭下摄司工作筹建分厂。1937年11月,局势更加紧张,吴祖培随着中央电工器材厂提前到了湖南湘潭。

第一次南京之行,为时3个月,印象中,战争近在咫尺,满目的法桐飞翔也飘得张皇,南京的空气里充满了焦虑的味道。

远渡重洋学习日光灯技术

1945年日本投降的那一天,吴祖培受资源委员会公派出国。他离开成都,前往重庆坐飞机到了印度,再坐轮船经过地中海、大西洋到了纽约。此时,吴祖培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学到美国的日光灯制造技术。

1938年的时候,美国通用电子公司成功研制出了日光灯。但这个行业的从业者认为,电光源是工厂的黄油和面包,是用来赚钱的,所以,他们对此技术进行封锁垄断,吴

祖培想参观都不行,更别说进厂工作或者当实习生了。他到美国的第一愿望破灭了,但他不甘心。

眼见学习日光灯技术无望,吴祖培转而是到美国密西根大学就读一年,得到了硕士学位。毕业后他仍想进日光灯公司工作,但还是没能如愿,不得已,在教授的推荐下,他到了RCA公司工作。

在RCA公司,吴祖培在电子束管实验室工作,他掌握了投影管的技术。由于工作的关系,有时到荧光粉实验室,从而也学到了荧光粉的制作技术。可是,为何RCA对新技术不设防呢?“RCA老板是犹太人,因为二战期间,中国政府对犹太人有帮助,所以他也对中国人很好。”

在美国留学一年、工作两年期间,吴祖培一头扎进了学习工作中,“我根本无后顾之忧,当时政府每月提供我180块大洋的生活费,国内200块大洋的工资照付,我在美国公司每月亦有300块美金的工资。”但很快,他就放弃了这种舒适的生活,回到国内,并第二次来到了南京。

是什么原因让他放弃已拥有的一切,义无反顾地回到国内呢?

第二次来南京,他成了“日光灯之父”

1948年初的一天,埋头工作的吴祖培回到了纽约寓所,看到了两份报纸,一份是《三民日报》,一份是《华侨日报》,这是他到美国三年来第一次看到国内的报纸,对国内的情况有所了解。看完报纸,吴祖培当即决定回国。

1948年4月,吴祖培回到了上海,和妻儿团聚,又到了浙

江,看望父母。两个月之后,他携家带口再次来到了南京。

这一次在南京,吴祖培居住在迈皋桥附近的电工楼,后来搬到了中央门外的迈皋桥。

他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央电工器材总公司辖下的南京电照厂(即今天的华东电子管厂)任正工程师兼副厂长,当时厂里从美国进口的一批制造灯泡和电子管的设备正处于建设期。

新中国建立后不久,担任南京电照厂厂长的吴祖培就开始研究日光灯。没设备,没仪器,就土法上马。烧荧光粉需要的电炉,厂里没有,就向南京牙科医院借到一个一千瓦的高温电炉;没有装荧光粉的白金坩锅,没有研磨荧光粉的玛瑙研钵和紫外线杀菌灯,就去上海买;没有拉管机,就人工拉管……

在吴祖培的带领下,厂里十几个技术员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将日光灯研发成功。1951年五一游行时,电照厂就拿着日光灯的模型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过主席台。

1953年,日光灯开始批量生产。刚投入市场的时候,日光灯的质量也不尽如人意:使用没多久,日光灯管两端就发黑。电照厂的技术人员又技术攻关,用了半年的时间将问题解决了。作为一种新兴的商品,当时一根日光灯售价为人民币15元,进口的售价30元。15元是个什么概念?“就是电照厂工人近一个月的工资。”大概三年后,日光灯的价格下跌了,5块钱,进口的售价也跟着跌到10元左右。“如果不是有了自己的日光灯,进口日光灯的价格是不会下降这么快的。”

日光灯的销路很快打开了,因为无论是使用寿命,还是发光效率,它都是白炽灯寿命的5到6倍。

中国第一只黑白显像管在南京诞生

1957年,吴祖培到苏联进行交流,遇到了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刘寅副部长。刘寅说,在莫斯科大使馆,他看到了《人民日报》上刊登文章,说要在1958年的五一劳动节开播中国自己的黑白电视。实际上,这个时候,中国连显像管都没有。

“显像管在哪里?刘寅问我,接着又说,现在这个任务交给你了。”吴祖培回忆说。紧接着,吴祖培就被安排到莫斯科电泡厂参观,并被交代,要什么设备,什么材料,可以在苏联购买。当下,吴祖培等人



吴祖培(右二)在美国留学期间的留影 快报记者 唐伟超 翻拍



吴祖培(右四)受到邓小平的接见 快报记者 唐伟超 翻拍

商量,就在苏联订购了一台压机,一台玻璃模具机,一台平板芯柱机,一台屏锥封接机。苏联方面也提供了生产荧光粉的配方和玻璃的配方。当然,这些配方不是白给的,作为交换,吴祖培向苏联提供了投影管玻璃成分的资料,并且告诉他们日光灯两头发黑的原因及改进的方法。

第二年年初,订购的模具机和平板芯柱机到了,可是剩下的两样始终未到。吴祖培和技术人员又土法上马,克服种种困难。显像管用的是特种玻璃,厂里解决不了,技术人员把配好的材料送到上海玻璃六厂溶解,没有压机,就人工压;没有封接机,就让四名工人用四排火在长方形玻璃壳四边熔合封接屏锥。人工压、人工封……经过一系列磨合,1958年4月,中国的第一台黑白显像管诞生了。“但显像管研制成功后,南京基本上做样管,少量生产,大量生产交给了成都红光电子厂。”

而正是为了建设红光电子厂,吴祖培再一次离开了生活了十年的南京。

第一只彩色显像管的诞生也与他有关

1958年8月,吴祖培离开了南京,前往由苏联援建的成都红光电子管厂。1977年,吴祖培又被调到咸阳,参与组建我国第一个彩色显像管厂,即陕西彩色显像管厂。这个厂主要是和日本日立公司合作的,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在同一时期,美国RCA公司在波兰建厂失败,日立公司在芬兰建厂也都失败了,RCA的同行们对日本日立公司能与中国合作建设成功这一大而全的中国第一个彩色显像管厂感到震惊,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日立公司询问原因,日立公司的专家横井昭夫说,“因为我们的合作对象是内行,是专家。”对吴祖培表达了由衷的敬佩。

因此,1989年,当深圳筹建从日本引进技术的深圳赛格日立彩色显示器件有限公司时,日本方面指名道姓要与吴祖培谈,并聘请他为高级技术顾问,邀请其到深圳发展。但是,作为陕西省政府特邀技术顾问,陕西省说什么也不肯放吴祖培,后来,陕西省与深圳达成协议,把吴祖培的关系放在陕西,“让我两边都走走。”

美国人赠送的玻璃小蜗牛引起轩然大波

在“文革”之前的许多政

治运动,比如三反五反、四清等运动,吴祖培没有受到冲击。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终究还是被冠上了“反动技术权威”之名,隔离审查了6个月。

1973年,为了尽快发展中国的电子工业,周恩来总理组织电子部专家去美国考察,点名让这一领域的权威吴祖培去,虽然又遇到了阻力,但电子部一直坚持非吴祖培不可,吴祖培得以成行。但就是这次美国之行,引出了轰动全国的“蜗牛事件”。

这次吴祖培考察的就是25年前自己工作过的美国RCA公司,这让他异常激动。下了飞机,RCA派了专车来迎接,热情款待。结束考察之前,考察团来到了美国康宁玻璃公司,正好时值圣诞节前夕,康宁公司向考察团每人赠送了一只玻璃工艺小蜗牛。“我们一开始不肯要,这不符合规定,但是他们坚持要送,并且表明这价格不过55美元的工艺小蜗牛,是作为圣诞节礼物赠送的。”

回国后,考察团成员将小蜗牛拿出来给部长看并进行汇报,大家都认为康宁公司的玻璃确实好,透明度高,没有气泡。谁料这个事件被一个别有用心的人写了一封信给江青,说他们到美国,拿着帝国主义的礼品得意洋洋,显摆美国人是后台,并说那蜗牛是康宁公司讽刺挖苦中国的爬行主义。这件事立刻成为四人帮攻击周恩来的借口。江青到电子部兴师问罪,要求追究领导责任,还要求电子部立即将九只玻璃小蜗牛退回给美国大使馆,并向美国政府抗议,同时,要求电子部当众开会,进行批斗。

周恩来总理得知后,马上发电报给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问蜗牛在美国是什么意思?黄华立即回电,在美国,蜗牛象征幸福。如果临别时赠送友人蜗牛,则隐含着“慢慢走,一路平安”的意思。

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注下,此事才慢慢消停下去。

第三次来南京,揭秘养生之道

2009年4月,吴祖培第三次来到了南京。这一次,他居住在龙江某小区。今年3月,与他相伴54年的夫人杨影波去世了,他接受了在南京工作的儿子的建议,来到了南京。“杨影波是我的第二位夫人。我的第一位夫人是我在杭州省立高中上学时的同学,1933年冬,我们在上海订婚,1937年,我大学毕业前夕,和她在上海青年会酒楼举行了婚礼。在抗战期间,她为我生育了三个儿子,吃了很多的苦。比如,1938年,日本人轰炸老家嘉兴,她带着大儿子躲避战火到了宁波,后来又辗转去了桂林、重庆。眼看日子稳当了,可她在1954年时,因心脏病病逝于南京。”

而刚刚驾鹤西去的杨女士,则是1955年,吴祖培经同学介绍认识的,她当时是上海外贸部职工医院的主治大夫。婚后,杨女士对吴祖培与前妻的三个儿子视如己出,牺牲了自己的事业,用心地抚养着他们。

如今,96岁的吴祖培最常被别人问到的,就是他的养生之道。吴祖培告诉记者,不说假话心不慌,生活规律有保障。他对饮食从不挑剔,好的不多吃,“坏”的不少吃,合理搭配就行。每天要保证睡够6个小时,还要坚持到楼下走路2000到3000步。

本版主笔 见习记者 张荣 (请黄先生来报社领取线索费100元)